

# 試題資料應與提問內容相關



## 通識全攻略

上篇提到「具質素的通識考卷」的基本要求，是提問用詞必須具備精準度和邏輯性，好使題目和答題要求具有一致性。筆者提及的準則並非子虛烏有，而是建基於《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》第5.5.3章節關於公開考試的描述，本篇會再就資料設計提出一些參考準則。

### 準則二：資料設計的關聯性和延伸性

以2017年卷一第一題b題要求考生剖析有哪些因素影響少數族裔青年人的抱負為例，資料提供個別少數族裔青年人在目標訂立和求職上的困境，既與題目有所關聯又能讓考生作出合理的延伸，例如從投考警察的困難延伸至語文和學習能力的影響因素；又以2015年卷一第三題為例，題目要求考生分析旅遊業上升的趨勢引起的全球關注點，資料提供全球航班和碳排放上升的趨勢，以及個別國家旅客外遊冒犯他國文化的事例，亦是讓考生可以引用相關資料延伸至更宏觀的影響（全球暖化、文化衝突）。由此可見，「具質素的通識考卷」的卷一資料，應該是與題目普遍性的提問內容

相關的個別事例。

相信大部分師生對2018年文憑試卷一資料的第一印象都是「多」，文字資料七則、數表資料合共三則和圖像資料一則，文字資料比起以往每一年都多（2017年僅一則文字資料、2016年有三則文字資料），資料多寡本身並非考評設計的優劣關鍵，重點還是能否準確拿捏資料的關聯性和延伸性。

從試卷可見，基本上所有題目都合乎關聯性和延伸性的要求，一方面未出現任何無關答題要求的資料內容，另一方面資料內容亦給予考生足夠的延伸空間，例如卷一第一題b題，要求考生剖析參與跨境義工計劃時香港義工面對的挑戰，資料A提供義工計劃的目的、責任和處境，而資料B陳述個別香港義工的心態和能力，考生正可透過靈活比對兩則資料回答題目（香港義工能力不足以應付義工計劃的處境），展現其應用和分析資料的能力。卷一資料設計上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不必要地合併文字資料、數表資料或圖像資料，例如第一題資料A、第二題資料B和第三題資料B，問題在於考生在作答時較難指涉資料，瑕不掩瑜，卷一的資料設計仍然屬於「具質素的通識考卷」。

至於卷二，根據《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》第5.5.3章節延伸回應題的設計是「透過可引起討論的材料，提供更廣泛的層面，讓學生展示所學的多種高階能力」，雖然考評指引未直接指出資料在卷二的作用，但是，從歷屆試題和考評報告可見，資料在卷二基本上是提供部分的思考角度

和個別事例，所以應該具備基本的關聯性和充分的延伸性，例如2013年卷二第二題要求考生提出驅使港人參與國家大事的因素，資料分別提供保釣行動和四川地震籌款等圖片，正正給予考生具關聯性和延伸性的內容，考生可以從保釣行動延伸至歷史和國民身份認同感、從四川地震延伸至同理心，又可以由資料事例舉一反三，包括慶祝國慶、華東水災募捐等例子。再者，資料本身的論點不足以令答案位列上品，所以考生應再額外提出大眾媒體、家校教育、政府表現等關鍵因素作為論點。

至於2018年卷二的資料設計在第一題和第二題上都符合上述的要求，問題在於第三題。雖然一般卷二的資料多數有助於回應a題多於b題，但是資料無理由未提供任何相關的論點和論據，卷二第三題b題要求考生評論全球化對大規模疾病的控制是否妨礙多於促進，雖然該題的資料在最後一段有提到聯合國的行為，包括舉辦會議和要求國家堅守承諾，但僅僅有助於剖析「促進」而無助於剖析「妨礙」，極其量可以延伸至承諾缺乏強制性所以「無助促進」，對於「妨礙」的相關論點則乏善足陳。

有論卷二根本毋須理會資料，或者資料不一定要提供論點和論據予考生。然而，試問通識考核和中文作文又有何分別？的確，在沒有任何資料的情況下，師生們都能夠提出嚴謹和具客觀論據的答案，既然考評設計明言要有「可引起討論的材料」，當然不能夠抹殺資料的價值和功能。再者，卷二本身可以讓考生選答任何一道題目，若然個別題目提供充分論點和論據，個別題目則未有任何論點和論據，似乎在考評的公平性上亦出現一定的問題。

（檢視通識教育科的考評質素・中）  
香港通識教育會理事 羅恆威

## 擺脫傳統 建立工業化社會

# 「現代化」始於科學興起



現時，大家自稱「現代人」，身處「現代」社會。這個說法，不能算錯。我們不是「現代人」，難道是古代人，或近代人嗎？按照這個意思，每個時代的人都可自稱為「現代人」，明朝、清朝的人都可自稱為「現代人」了！事實上，中國人是20世紀才開始稱為「現代人」，因為中國在20世紀才開始「現代化」。

「現代」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特殊的意思，指西歐1500年開始科學和工業革命，帶來的社會、經濟、政治、家庭、文化以及個人價值的巨變。整個過程可分開三個階段：早期「現代化」，由1500年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。經典或中期「現代化」，由1789年至1900年。1900年至今天，是所謂晚期「現代化」。有學者認為，到21世紀，人類已進入後現代的時代。

### 全球化就是「現代化」

在這500年當中，整個世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變。這些巨變始於西歐，隨着英、法、德、美國等列強殖民地主義式掠奪，而遍及全球，是以許多學者認為全球化就是「現代化」。任何趕不上巨變的國家，傳統的

秩序都面臨挑戰。只有迅速的「現代化」才能克服挑戰，否則便淪為強國的魚肉。

「現代化」始於擺脫宗教和教廷的控制，科學興起，用觀察、實驗的方法研究天文、地理、生物……等等，得到知識。科學知識可用以改變世界和人類社會，比如發展科技、發明機器代替人力生產。以前，一雙鞋、一件衣裳，由一名工匠製造。到18世紀，通過分工合作、流水作業，任何貨品都可以大量生產，成本大降，一般人的生活得以改善，工業革命便由此誕生。任何能稱得上是「現代」社會的，必是工業化的社會。

### 西歐演變成資本主義

工業化要勞工聚集在工廠工作，不然怎能分工合作、流水作業，大大的提高生產效率呢？傳統社會，鄉村生產糧食，城鎮搞貿易、手工藝，亦是文化薈萃之地。在「現代」社會，一切集中於城市，生產、貿易、文化莫不如是。1600年前，有10萬人口已是大城市，有100萬人口的城市，簡直是鳳毛麟角。當今，超過1000萬人口的大都市，比比皆是。任何能稱得上是「現代化」國家，必有70%以上人口居住於城市，皆因工業化必

帶來城市化或大都市化。

西歐的「現代化」，演變成資本主義。許多西方學者，便因此認為只有走資本主義的道路，才可「現代化」。歷史證明，這個看法並不正確，但必須具備資本主義的幾個重要構成條件，「現代化」才可成事。這些條件包括：個人可全權運用資金，他的人身自由和土地產權不容侵犯。如此，他才可自由成立公司，聘請勞工，從事生產，並將利潤再投資牟利，滾雪球的得益。市場必須有足夠自由，給任何人進入，打工仔累積足夠資金及知識，也可創業，由市場及消費者決定誰勝誰敗。

「現代化」社會必須具備市場經濟。市場不講道德，只講利益，牟利和生產，比分配更重要。傳統社會已是貧富懸殊的社會。「現代化」社會更會加劇貧富懸殊。由於人口集中於城市，貧富懸殊會影響每個城市人的生活。傳統社會，山高皇帝遠，政府對人民的控制，極為有限。在「現代化」社會，政府的影響力大增，由個人健康、醫療、教育、工作……等等，政府都不能不插手。

撰文：博文

## 「現代性」要「知書識墨」

### 知 識 點

隨着「現代化」而來的是「現代性」（modernity）。所謂「現代性」，指所有稱得上「現代」社會必具備的特性。傳統社會大多是農業社會，文盲往往佔80%—90%的人口。無他，耕田養牲畜，不用識字。工業革命前，印刷未普及，書籍十分昂貴，有錢人才買得起。那普通人讀書識字有何用？

「現代人」有政府提供免費教育，幾乎人人都識字。文盲不配稱為「現代人」。不識字，連一個表格都不會填寫，在現代社會根本寸步難行。傳統社會，知識、資料和信息大多口耳相傳。「現代」社會則靠文字和閱讀而普及。因此，「現代性」之一，便是「知書識墨」。



### 思 考 點

傳統中國人相信歷史是循環的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興盛過後便衰落，否極即泰來。人的一生亦如是，有得有失。老子甚至認為：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意思是，今天的禍，會帶來日後的福。今天的成功，導致明天的失敗。

可是，西歐「現代化」伊始，啟蒙時代的思想家，便相信歷史是直線前進的，即是說，明天一定好過今天，不然，就有人犯了錯誤。「現代人」都預期生活會一天天好起來，不然，他便會怨天尤人，尤其是怨政府未能好好照顧他。這算不算是「現代性」之一？學者各有看法，見仁見智。

## 明天一定要更好？

# 在傳統土壤上建立「現代化」



## 書 架

香港自50年代以來都是一個學習中國歷史的理想地區。我們在書局、在圖書館，可以找到不同立場的歷史著作；在各大學的歷史系中，我們有大批不同觀點的學者；在媒體中，更常有不同的人士談歷史，觀點雖然偶有標奇立異，但亦顯出了香港「史學」百花齊放的特色。

當然，香港史學界中最足以自豪的事，肯定是錢穆先生在上世紀50至60年代在香港的教學。我輩晚出，無緣一睹錢先生的風采，只能從他的傳世大作中，一窺其學術素養，習得一點皮毛而已。錢穆的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4年），我翻閱不下三次，每次一讀，皆有所得着。能寫出這本超越時代的制度史書，除錢先生之外，當世應無他人。在《總論》一章，錢先生先探討了中國傳統政治上存在着不少問題，令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難以順利地轉型，然後他又提出未來中國政治和政制要成功地現代化，必須建基於傳統的「土壤」之上。

中國之將來，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來簡化，使人才能自由發展，這是最重要的。但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。重要的不是推倒，而在建立。例如建立民主制度，有人以為只要什麼事都待集體商量過，加上不停開會，便可稱為民主（正正指出了今天香港立法會的情況）。我們天天說中國的法治不足夠、民主不完善，其實不夠的應是人才。國家現在將如何酌採西方的新潮流，如何拿自己以前的舊經驗，來替自己打開一出路，來創新法，運用人才，這是當代執政者的責任。西方各國各自在創制，在立法，他們覺悟到了有毛病，還可改。我們如只是一意模仿抄襲，就不會有任何覺悟。西方各國自有其歷史，我們又如何能將自己橫插進別人家的歷史傳統呢？

錢先生對國家的發展觀，正是今天國家堅持的發展現代化方向，有論者稱這種方向為「中國模式」，成效顯著。反觀香港一些政客、學者，心中只有西方，無論談到任何改革，皆主「模仿抄襲」，盡見「不讀史」之弊。

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



▲丘成桐（前排左二）與部分「恒隆數學獎」得主

